

中国古代哲学 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

〔韩〕梁再赫 著
金珠英 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

[韩]梁再赫 著
金珠英 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 \ 梁再赫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8

ISBN 7-5073-0844-8

I. 中… II. 梁… III. 中国-古典哲学-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935 号

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

〔韩〕梁再赫 著

金珠英 译

*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华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24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 000 册

ISBN 7-5073-0844-8

定价: 16.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金奉花女士
(1902—1986)和永志难忘的父亲梁根永教授
(1905—1950)。

译者序

三年前，我由于偶然的住到了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方哲学系的养贤斋。这是该系拿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的住所，可以说是韩国东方哲学学者的摇篮。不久，我发现这些贤子们几乎个个都热心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老子、庄子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经常拿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谈论毛泽东哲学与老庄“道”哲学的关系。他们的话题吸引了我，他们手中的书更使我感到新奇。那时我就有意将此书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但由于渡美留学而未能实现。三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奉献给我的祖国的广大读者。这本书就是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方哲学系梁再赫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思想的渊源》。

在我国国内不乏有对马克思、列宁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作比较研究的论著，但很少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庄的道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梁再赫教授的这部著作正是我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梁再赫教授潜心研究东方哲学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德国留学数载，有较深厚的西方哲学基础。现在献给各位的这本书就是他多年从事东西方哲学研究的结晶。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书中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研究的新颖独特见解介绍给中国哲学界的广大读者。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图忠实于作者的原意，并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图书馆、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查阅并校对了作者引用的原文。借此机会向上述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翻译过程

中也得到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诸位教授、学者的指点，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者
于美国伯克利

引 子

记得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对哲学感兴趣。这也许是因为“六·二五”内战的凄惨的经历以及在东西方冷战的敌对状态中反共成为绝对真理的政治气氛，使得我产生了“我能做什么”的茫然的疑问，与此同时，对哲学有了关心。当时我认为哲学是认识和体会神秘深奥的道理，使所有的人从现实的苦闷和烦恼中解脱出来，过着平静的日子的一门学问。

但是花费我四年时间去学习的东方哲学认为，儒学的传统伦理秩序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准绳和价值观。这使得我在现实当中时常感到不满。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们大多是旧时代私塾出身的汉学者，他们毫无选择和批判地把他们所学到的封建的、军国主义的价值观传授给我们。我从部队退役以后，曾怀着保护和发展的民族文化的志向，在《民族文化促进会》翻译了三年的古典文献。我认为，保护民族文化并不是保护和赞美所有古代的东西，而是批判地收容历史上为民族利益与外敌斗争的有教育意义的东西。然而当时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只不过是毫无选择地翻译传统的赞美王亲贵族的或是事大主义的古籍而已。

“那么，我应当做什么？”带着这样一个新的问题，我赴西德海德堡大学留学。因为以往习惯于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教科书，我担心应付不了写具有条理性的论文，所以又将大学课程从头开始学了起来。1978年夏天在米切尔·修尼生（Michael Theunissen）教授的指导下我写出了《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实用主义背景》的论文，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后来苦于半工半读又转到科尔斯卢切（Korlsruhe）大学。1983年在恩斯特·奥德曼（Ernst Oldemeyer）教授的指导下写出了此书。在德留学期间，我参加了修尼生教授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全部课程的学习。通过这一课程我学到了德国的唯心论转为社会哲学的具有相当深度的哲学史。社会学与西欧近代政治经济史是我的第二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学习使我能具体地分析和理解德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的哲学观点不再是空洞的而是以社会政治经济为基础的；不是代表以王族为中心形成的少数特权阶层的兴趣和利益的神秘论和理气论，而是以不断发展的具体社会为基础的批判的哲学。

与社会、经济、文化一样，哲学也是政治权力所利用的工具之一。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哲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它当然不是有利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 36 年的哲学教育的影响至今仍然妨害着我们为争取真正的自主统一所进行的所有的研究。所以，我们如果想搞好哲学研究，首先必须读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史。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以及解放后所进行的崇美事大主义的教育，为了掩盖帝国主义控制第三世界的实质，鼓吹哲学只是追求形而上学本质的“纯理论”。毫无察觉地被这种观点熏染的一部分保守学者及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们至今仍在大学的讲台上或者学术研讨会上，无视现实政治、经济的弊端，只是一味地大讲特讲空幻的理想世界和超脱的圣人君主的伦理道德。

“我能希望什么？”我的基本的哲学态度就是想用通俗易懂的说法解释哲学。不仅是让知识分子、贤人君子懂得哲学，而且让所有的民众理解哲学，对哲学感兴趣，并且应用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所以我的哲学主题并不是神话也不是什么形式的“主义”，而是你我之间政治的、经济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哲学讨论再也不能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而应该回到能够解决民族分裂的基本矛盾的政治经济现实上，分析和排除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发展我们的民众民族哲学。如果此书能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我会感到欣

慰的。

这本书的德文名称是《毛泽东思想中的自然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渊源》。这本书描述了在中国古代的《易经》和《道德经》中出现的阴阳论的“自然辩证法”，在儒家被释为王道，在道家被表现为自然之道，以及毛泽东把它完成为矛盾论的“唯物辩证法”的全过程。在第一章分析了“道”这个概念；在第二章里阐述了毛泽东接受传统哲学和西欧马克思哲学的过程；在第三章里主要是对庄子和毛泽东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以此来说明自然和社会实践的问题。所以此书翻译成韩文的时候书名改为《庄子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把原书名作为副标题。书中的第一章关于道的概念分析部分曾发表于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刊行的《程理学大系》第四卷上。

最后我要向在我留德十三年中最后二年给予经济资助的自由民主党 Friedrich - Nan man Stiftung 财团致谢。并向参加翻译工作的成均馆大学东方哲学系薛宪英等两位讲师以及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欣然承接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社的金泰京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并期待学界前辈、同事、青年学生们的批评指正。

1989年1月25日

梁再赫

于成均馆大学研究室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概念	(12)
第一节 道的概念	(12)
第二节 孔子 (公元前 551—479)	(23)
第三节 道家	(31)
3 - 1 老子	(31)
3 - 2 庄子	(48)
第二章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及欧洲马克思哲学的继承	(69)
第一节 传统的阴阳论	(69)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哲学及毛泽东对此的批判	(82)
第三节 辩证法——作为唯物论基本范畴的无限矛盾的 本质	(91)
第三章 毛泽东“自然”和“实践”的用法	(104)
第一节 毛泽东“自然”和“实践”的用法	(104)
1 - 1 作为自然法则的辩证法	(104)
1 - 2 自然中的矛盾 (阴阳)	(113)
1 - 3 人类社会的矛盾	(119)
1 - 4 毛泽东和传统哲学	(128)
第二节 “儒教、道教”世界观和“欧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毛泽东思想上的统一	(135)
2 - 1 无限地变革社会的实践	(135)
2 - 2 结论: 大同世界	(148)

绪 论

本书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然观念和毛泽东理论中的自然观念进行比较，从而阐明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发展的人们的自然观。与此同时阐述中国哲学的发展和西方哲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和区别所在。

本书的目的首先在于通过对古代中国的自然观和毛泽东的自然观进行比较来展示对自然，哲学的态度由顺应发展转为对抗的典型的事例。从古希腊开始到近代工程技术学上完成的对自然和工程技术学的态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也存在着与上述现象相似的情况。与自然的交流方式由不干涉主义发展为干涉主义。

本书研究的实际贡献在于，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当今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有重要意义。对于至今只是一味地评价为“进步”的技术性的经济上的诸多变化给予当今的世界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所下的评价是两方面的。事实上在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同样也有要求复兴类似古代中国的顺应自然观的呼声。从这一点来看，探究中国文化脉络中的相互对立的自然观以及附着于它的价值倾向性之间的不协调是如何萌生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历史就是试图把双方的哲学渗透包容的历史。从中国方面看，在试图渗透和包容的努力方面起重要角色的概念是“道”。然而“道”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用途上被译成不同的词。所以人们不仅未能明确地理解“道”这个概念，相反却引起愈来愈大的混乱。^①对“道”的理解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是由认识的立足点不同而引起的。

一方面卢梭、黑格尔等哲学家从远离于科学的角度去接触中国哲学。属于这一类型的哲学家急于求得统一，只是单方面地看到两个文化之间并列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象伏尔泰或者莱布尼茨这样的学者对陌生的文化深感兴趣，努力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翻译。然而他们对各种概念的发展历史缺乏认识。他们甚至对于属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的相同的概念之间有区别或者具有对立意义的事实往往给予忽视。为了弄清楚这一点，让我们看看具有“自然法则”意义的“道”这个概念发展的历史。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用拉丁文翻译了老子的著作《道德经》。在这本著作中“道”这个概念具有深奥的意义。^②由于翻译是由天主教以及新教的传教士们进行的，所以“道”这个概念首先从神学的意义上解释为神的语言。^③1880年，F·H·Balfour 在自己的著作《道家的伦理、政治以及思辩的文献集》中把“道”从自然科学意义上与“自然”作比较进行了考察。“道翻译为‘路’的时候，就意味着自然的路即自然的运行，自然的秩序以及自然的法则。道被翻译为‘理性’的时候就意味着作用于所有的被造物生存，赋予生命的同一的力量，即世界的智慧的原理。道被翻译成‘教导’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是自然法则以及关于神秘的正确的教导……这里的自然是具有能产生性意义的自然，具有被产生意义的自然在中国语里叫做‘万物’”。^{④⑤}

在中国曾有推崇道家的人掌权的时期，那时“道”的概念在使用上与西方一样具有多种意义。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冯友兰认为“道”是宇宙形成的原理。^⑥但是当他用西方语言翻译的时候音译为“Tao”^⑦，胡适受 Balfour 的影响认为“道”是“自然法则”。^⑧

本研究也同 Balfour、以及胡适一样把“道”看成是自然法则。并且用大量篇幅把从《易经》至庄周为止维持深奥复杂概念

的“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毛泽东的矛盾（阴阳）概念作比较。

在第一章里，本书将从语言、伦理史角度去阐明从《易经》至孔子、老子、庄子的、展开和发展中的、作为自然法则的“道”的概念。从“道”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原始的含义上看（这个意义从道的字形‘衡’上可以看出），“这个道字的构成是头颅（思维、理性）以及变化（移动、人生）”。在很多经典中，也是把道作为路，即行走的道路来使用的。特别是在《易经》中，是把道作为宇宙的起源的意义来使用的。

孔子联系当时的封建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把道分为三种：即民众的道（人道）、王道、自然的道（天道）。天道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们为了要达到天道必须通过王道。老子却与孔子不同。他蔑视王道，他认为民众无须经过王道，可以直接达到自然之道。孔子在他的伦理学说中把行为（行动或实践）作为第一位来强调，进而把思维看作第二位。然而老子却主张通过内省以及无为的过程和静心的原理顺应自然秩序，把行为看作第二位。后来庄子把自然（天）的道引到民众的道当中去。进而自然之道与民众统一，民众靠自己达到自然之道。

尽管庄子属于道家，但他却把孔子的理论和老子的理论融合起来，并且发展为与以往的理论从实质上对立的新的理论。“道”从此得益于庄子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下道”（实践）和“上道”（理论）包容起来，把“所有的对立物”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后来当毛泽东接受欧洲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时候，他就以此为线索发展了与庄子方法论相似的思维方式。所以毛泽东的矛盾（阴阳）概念与庄子的“道”的概念相对应。

在第二章里本书将展现古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与宋代（960—1279）的哲

学家们有关联。在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中（上道），道（阴阳）的概念被推崇到一种不变的，创造一切存在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于是曾在“天道”中追求最高真理的朱熹的形而上学的思维，足可以与曾经追求最高“圣”的境界的孔子的伦理方面的努力相提并论。他们都只是追求至高无上，拒绝顾及其它。

因为孔子以后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只是强调不变的，创造一切的存在，即“天道”（自然之道），所以“人道”（民众之道）被忽视了。然而庄子却把人道包容于“通过实践把自己忘却于实践中”的自己的第二个原理之中。

毛泽东与孔子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是可以包容的。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里提出。这个包容就是把天道（理论）包容于人道（实践）中。毛泽东把实践的道（下道）与理论的道（上道）这两个道的包容统一称为“辩证法”。与马克思一样，对毛泽东来说实践对于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社会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或是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到自己相对于自身以外的自然而言是“历史的”存在。也可以说只有把置于外部的自然（客体）根据人的需要合理地进行改变，才有可能同时把自己（主体）进行改变或者发展。

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将发现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两个重要的根源。

一方面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具有本质上的共同点。当然也有几个明显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相接近。

关于这一点，可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阅读并不广泛，甚至远不如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而且有些是靠他自己的

思想进行补充的事实中得到证明。以上事实在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以及政治著述，特别是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峙中反映出来。

我的意图是想对毛泽东的哲学进行批判的分析，即学习和发展他的理论上的教理和知识，对他的认识论、思维方法以及他的世界观进行批判地分析。为此要研究他的有关著述，并与他的实践进行比较。

这样的分析只能通过对以下的两个提问寻找答案的方式进行。

1. 毛泽东的有关辩证法的著述与以往其它有关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多少相同点，或者有多少差异？

2. 毛泽东的实践反映他自己的理论的程度如何？

关于第一个提问还可以提出下面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出现的神秘的表现形式在毛泽东那里具有多少科学意义？

关于第二个提问，由于毛泽东的实践领域非常广泛，使得我不得不只选择一个例子来说明。因而我探讨了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辩证的观点是否在与儒教以及道教哲学的对峙中反映出来。

受无限变化的“道”的世界观的影响，毛泽东把对立的力量以及矛盾的无限分裂和变化描述为“自然和社会的对立以及与此对应的两种思维的对立”。与此同时，毛泽东克服了马克思的世界末日论的萌芽。然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毕竟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有原则性的区别。道教的传统以及儒教的传统根据“道”的世界观把天、地、人的构造从世代的形成和家族关系中找到了模式。因而人们受各自传统的影响，或是通过无为，“被动地顺应自然”；或是通过特定形态的“主观道德性”的行为，来为维持自然秩序尽力。但是毛泽东却与此相反，他所主张的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斗争”和“积极介入”来进行变化的

关系。“毛泽东思想”哲学中人（主体）是客体（自然）的主人。毫无疑问，我认为毛泽东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革命意识）是受了欧洲哲学，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儒教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不断施予的影响，以及毛泽东思想上的儒教伦理的思维烙印。然而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革命的意识”世界观相结合的程度比起儒教的“主观伦理”人的意志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相结合的程度强得多。从儒教徒或者在儒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的角度看来，事物通过人的“主观伦理”的意志去加工，去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以这样的传统思想为背景，毛泽东得以排斥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决定论”的倾向。

但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维与儒教根本不同。儒教实际上拥护“王道”即一种“具有儒教教养的人的独裁”，而且通过“调和”的世界观去抹杀所有的阶级矛盾并将其解释为自然法则。相反，毛泽东为了有意识地改变所有的状态，进而发展自己，根据“对立统一的法则”，对所有的状态不停地提出疑问。毛泽东回归实践的两条路的思想正从深度与广度上与庄子的“道”的概念相应。庄子把道看作是路，进而又把它看作是万物以及万物的运动所具有的法则。然而在实践的观点上，毛泽东和庄子之间也有区别。对于毛泽东来说，实践是有意识地造就现实，而对庄子来说，实践是忘却现实。

在此，对毛泽东的哲学与他的中国古代哲学根源的比较上采用的是举例的方式。即把孔子、老子、庄子以及毛泽东等哲学家各自的关于“道”、“辩证法”以及“矛盾”等概念罗列起来，并提出所具有的共同点与差异。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脉络中形成的“道”这个概念的历史的发展，曾引起过儒家和道家之间对应的自然观之间不可协调的紧张

关系。这个矛盾的深刻性并不次于这两者与毛泽东理论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对立程度。然而尽管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我们仍可以从对立中找出他们之间的辩证的统一。

关于毛泽东和古典哲学的关系，西方曾有人论及过。但是遗憾的是除了 de Bary^⑨ 的观点有价值外，大部分只是停留于表面的议论。^⑩

有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西方有不少著述，但与我们的主题只有间接性的关联^⑪。而在日本，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大部分是有关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革命理论的。^⑫

中国的共产主义哲学与古典遗产的关系是由西方有名的权威人士所确立过的。当然这些研究也只是限于几个方面。而且这些研究所选择的侧面也没有与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及古代经典有系统的联系。^⑬此外，这些探讨几乎全部只是把中国共产主义与儒教联系起来，却把道教置之不理。本书的研究是以托马斯的观点为基础。托马斯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道教哲学对于毛泽东的影响远比儒教的影响强烈。^⑭所以对于道教的理解会有助于更加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西方人们的眼中，中国很少有哲学家，而且扎根于中国思想的哲学家相对来说更少。^⑮然而在北京的哲学出版物中，强调毛泽东思想中内含着“中国的因素”。甚至在一个政治路线中也“要求有中国固有的哲学”。^⑯然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人为了实现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对毛泽东的著作和孔子、老子或者庄子这样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给予系统的比较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如果找出毛泽东的哲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一致的事实的话，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益处。

我试图阐明毛泽东的理论与儒教的主观伦理学以及道教的形